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

梁云祥

内容提要 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不能简单将中日关系恶化都归咎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因为右倾化并非简单等于军国主义化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其中有些内容并没有违反现有国际规则和日本法律,或已经被日本国民所接受,因此,这一政治倾向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目前的中日关系之所以恶化,表面来看是由于钓鱼岛争端和历史认识等一些具体事件及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即双方的“安全困境”、国家发展战略冲突、实力对比相对平衡及感情恶化。所以,不能将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景寄托在日本政治不再右倾化上,而只能在承认日本政治现实和适度影响日本政治的同时,去寻找缓解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具体办法。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日本政治 右倾化 中日关系 结构性矛盾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开始出现根本性或结构性的变化,即开始出现战略层面的紧张状态,两国在一些既有或新的问题上都出现了全面的对抗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民间及媒体上也开始大量出现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注,有关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说法频繁见诸报端舆论,尤其在中日出现摩擦或冲突的时候,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报道更是急剧增多。那么,究竟什么是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目前中日关系的恶化是否都可以归咎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 梁云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概念

首先,需要界定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一概念。所谓“左”和“右”本来都是相对的概念,其判断主要取决于评价者的立足点。一般来说,人们将站在相对保守立场上的政治倾向视为右倾,而将站在相对激进立场上的政治倾向视为左倾;或者将其意识形态化,将信奉和坚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视为右倾,而将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视为左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中国立场来看,日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只可能是右倾而不可能是左倾的,充其量只能是其右倾的程度不同而已。不过,目前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理解,在中国国内却有一种泛化的趋势,即将日本政治上一切有悖于中国利益的行为统统归咎于右倾化。其实,有些政治行为似乎并非右倾化的产物,中日关系的恶化也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影响,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政治总决算”和“政治大国化”的内外政策,开始了日本政治的保守化或右倾化。用中曾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首先,我们要保卫日本美丽的大自然和日本领土;第二,保卫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价值;第三,保护自由的市场经济;第四,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积极的民族气魄。”^①也就是说,在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日本的一些政治家试图通过坚持和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固有价值观念和消除战败国地位的阴影来恢复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在国际政治中增大日本的发言权。或者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国际国家为国际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和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这一政治思潮中又增加了新民族主义的成分,使得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

此外,同一种政治现象在不同国家内会被判定为不同的政治倾向。例如,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究竟应该归类为左倾还是右倾,其实是不同的,因为日本的民族主义是为了维护作为一个右倾国家的民族利益,因此,似乎应该将日本的民族主义归为右倾化的内容之一。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就认为:“所谓右倾化的‘右’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很难严格定义的,如果说在日本就是要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那我是不同意的,不过在日本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却显然应该属于右倾化的表现。”^②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论对其如何进行评价,一般都会被认为属于比较左

^① 转引自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

^② 参见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13年10月举行的“历史和解与构建东北亚永久和平”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集。

倾的思潮或运动的一部分。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定义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呢?在这里,列举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

“政治右倾化是在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保守政党将其保守主义执政理念转变为国家意志和政策的为或过程,同时也是保守政党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政策层面上的具体体现。”^①“日本政治保守化的思想基础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其突出特点之一是歪曲和否认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而其最终目标是摆脱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所受的约束,成为所谓‘普通国家’。”^②“日本政治右倾化作为战后日本的一种政治倾向由来已久。冷战后,伴随着日本保守政党势力扩大而迅速发展。”^③“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它是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各种右翼势力为核心,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恢复靖国神社传统地位、美化日本侵略历史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股政治思潮。”^④

借鉴以上这些界定,本文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定义为: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一直坚持的一种政治理念,以及冷战结束前后在日本国际地位提高及日本国内革新势力衰落与保守势力增长这一基本政治生态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护其固有价值或传统,并宣扬、激发其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日本民众对此加以迎合或接受的一种社会思潮,主要包括试图修宪以追求成为正常国家,重新认识历史以彻底摆脱战败国地位,新民族主义的兴起,等等。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

根据以上定义,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应该包括政治理念、政策和社会思潮等几个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也就是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有其长久的政治理念追求,并且在合适的社会思潮下通过日本政府的政策表现了出来。具体而言,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

日本现行宪法是战后在美国占领和改造期间,主要由美国制定的一部宪法,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和改造日本,宪法体现了当时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的和平愿望,尤其是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

① 吕耀东:《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的关联性分析》,《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

② 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③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④ 同上书,第163页。

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①使其以所谓“和平宪法”的名声闻名于世。然而，长期以来，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和长期作为日本政治中坚力量的自民党中的一些政治家从日本恢复独立起就主张修改宪法，不过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受到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左翼势力的牵制，以及日本国民中和平主义思潮的制约，这一右倾化的政治目标难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修改宪法，而且这一主张越来越被日本国民和社会舆论所理解和接受。90年代末期，日本国会内部成立“宪法调查会”，就修改宪法问题进行探讨。进入21世纪后，根据当时媒体对日本国民的社会调查，赞成修宪的人开始超过一半。^②2012年4月，正在进行竞选并准备再次执掌政权的自民党提出《宪法修正草案》，其中就宪法前言和包括第九条在内的众多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③2012年12月安倍新政府上台后，即将修宪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日程，并且正在积极推进这一政治进程。

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宪法的修改，其目的就是要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国家大法，取消其中对日本的众多限制，从而像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比如，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自己的国防军、拥有同其他国家共同干预国际安全事务的集体自卫权、可以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向海外派遣军队，等等。

本来，一个国家要修改自己的宪法是主权范围内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近70年的今天，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也应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是有些日本的赞成修宪者纯粹是因为认为日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应该有自己制定的宪法而赞成修宪，而并非一定要修改体现和平宪法核心精神的第九条。但是，因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劣迹和有一部分政治家直至今天仍对这段历史缺乏正确认识，从而使得日本修改宪法的问题引起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关注和警惕，对其中第九条的修改更成为引起周边国家不安的原因。因此，日本的修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内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外交问题。

（二）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摆脱战败国地位

战后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政治势力，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日本社会整体反思战争的气氛中，其并没有成为主要的政治现象。从8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奠定和对政治大国目标的追求，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的声音和行动越来越多。例如，多名日本政治家公开否认

① 《日本国宪法》，〔日〕2011年《众议院手册》，日本众议院事务局，2010年11月发行。

② 如2001年3月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中，有54.1%的人赞成修宪。参见〔日〕读卖新闻社舆论调查部编：《日本的舆论》，东京：弘文堂2002年版，第477页。

③ 这一草案见〔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自民党修宪案全批判》，2013年3月。

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侵略行为,甚至认为这场战争是自卫战争和解放亚洲的战争,并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以及至今仍然常常出现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和“慰安妇问题”等等。虽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否认或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但作为日本主流政治势力的自民党政治家们却有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暧昧或具有错误认识。

在历史问题上,人们常常将日本和德国进行比较,即同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国家,为什么二者在战后历史认识问题上截然不同。德国不仅深刻反省和真诚道歉,并且将宣扬纳粹思想视为犯罪,而日本一部分政治家不但不反省历史和做出道歉,反而否认或美化历史,并且这样的行为最多只会受到国内外媒体的谴责,以及导致做出此种行为的政治家辞职,却绝不会成为犯罪。两国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不同,其实可以从两国战败方式的不同和两国传统文化的不同进行分析。德国是在顽强抵抗被彻底打败后投降的,纳粹政权被完全打碎,德国被四国分区军事占领并在接受长期改造之后才重新在东西两部分建立起新的政权,而且东西两德政权都同过去的纳粹政权没有丝毫的继承关系。因此,德国可以彻底否定纳粹。而日本却不同,日本在盟军并未进入日本本土时就宣布投降,此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并实施间接统治,即在保留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前提下对日本进行改造。虽然这一改造也对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和建立民主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出现,为对抗共产主义,美国很快在1948年初改变对日政策,即将改造削弱日本的政策变为扶植援助日本的政策,从而导致对日改造和清算并不彻底,不但保留了天皇制,日本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被延续了下来,甚至过去曾被定为战犯的一些政治家重新进入政界。可想而知,由这些同战前体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控制的日本政坛怎么可能彻底否定侵略战争的历史呢?

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也可以看出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德国是欧洲大陆的一个重要国家,在历史上曾经为人类创造过辉煌的文化,尤其在古典哲学和文学方面具有世界影响,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等世界著名人物。对德国人而言,纳粹历史仅仅是德国历史中非常短暂且并不能代表整个德国文化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很容易将其彻底否定。但对日本来说,其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贡献和著名人物,明治维新就是日本近代走向世界后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但它同时也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辉煌”与罪恶同时并存。因此,对日本而言,很难对近代明治维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做出清晰的认识。

平心而论,日本一些政治家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并不完全是简单地想要恢复过去的军国主义,因为他们也明白,战前的军国主义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且从目前的国际环境到日本国内政治的状况来看,日本要恢复军国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大部分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日本政治家,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现在,即希望通过忘却或修改历史,重新恢复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民族自

信心,消除战败国心理,摆脱战败国地位,进而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

不过,日本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战后的日本确实基本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和平国家,为国际社会也做出过比较大的贡献,但是试图通过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来摆脱战败国地位的做法难以被周边国家所接受,反而会阻碍或延缓日本获得更大的国际政治权力。

(三) 新民族主义的兴起

日本的民族主义曾在19世纪明治维新后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社会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极大限制而逐渐衰落。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且与作为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急剧缩小,甚至在众多经济和社会指标都超越美国的情况下,日本的民族自信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民族主义思潮重新抬头,于是新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其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89年由石原慎太郎等人所著《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之后又连续出版《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通过这些极端强硬的主张或诉求,可以看出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同当时日本泡沫经济处于顶峰时期的社会心态有关,即日本人大肆对外投资,出现了一种所谓“购买美国”的风潮,整个社会出现一种狂妄的大国情结,甚至开始蔑视过去崇拜的对象美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主导世界的国家。

但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其经济再度与美国拉大距离,紧接着日本政坛又进入一个全面动荡的时期。面对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和经济相对停滞缓慢的状况,以及其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其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不但没有停止脚步,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当然,这一时期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建立在自信心的基础之上,而是由于再次被美国抛在后面尤其是中国崛起甚至被超越,其心理遭受冲击和挫折后所产生了强烈反弹,在面临危机之下试图重拾民族自信,强调日本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然而,不论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自信满满,还是之后的具有危机意识的日本新民族主义,其主要政治诉求都在于通过颂扬日本民族及其文化的优越性,或渲染日本民族面临的危机和威胁,重塑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日本民族的集体意识。而且,这一股政治思潮往往同极端右翼思潮联系在一起,不但同样也否认或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和反对战争道歉,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甚至还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大肆鼓吹所谓皇国史观,试图重新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此外,新民族主义者还具有排外意识,将目前日本经济衰落和社会治安恶化归咎于外国人,并且拒绝外国对日本的一些批评,例如,将国外对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指责视为干涉内政等。当然,一部分新民族主义者并非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强调自

我优越的同时也强调与其他民族的和谐共存。

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虽然还没有成为日本政治中的主流政治势力,仅是一股社会思潮,但是它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日本政府也越来越纵容这一政治势力,甚至在某些政策选择方面还要依靠其支持。目前,日本新民族主义的政治势力正在逐渐进入日本政治的决策过程中,例如,在2012年1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成立不久的具有强烈新民族主义色彩的“日本维新会”一举夺得480个议席中的54个议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日本第三大党。

三、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追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根源,或者说广泛意义上的日本政治右倾化,其实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有关。从中国立场来看,美国主流政治基本上属于右倾,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当然首先要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经过其改造的日本,其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右倾的政治。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间接统治,保证了按照美国的意愿重塑日本,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能力遭到了比较彻底的整肃,但是政治上的右倾化却基本上被延续了下来。冷战开始后不久,美国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国家而改变了对日政策,变改造日本为扶持日本,允许一大批与战争有关的日本保守右倾政治家重新进入政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促使日本独立并开始援助日本甚至同其结成军事同盟。也就是说,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对日本国内保守右倾政治势力的容忍或支持奠定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基础。^①

即使在今天,美国也并不完全反对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对美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在很多问题是乐于见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比如,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增加其防卫能力,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协助美国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冷战结束前后日本政治的进一步右倾化,还有其他更直接的原因。首先,战后日本长期的经济增长及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巨大成就不但部分恢复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且长期的经济成就带来的社会稳定也造成了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右倾化及其对保守右倾政党的惯性依赖,这也使得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次,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开始重组,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出现政治变革,历来被视为国际格局在日本国内反映的所谓“55年体制”解体,其中作为左翼势力的社会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甚至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后起

^① 关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根源,参见张健:《关于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历史根源的几点思考》,《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4期。

起伏不断重组或新出现的政党几乎都属于保守政党,这一变化自然也加剧了日本政治更加右倾化。

最后,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关系中的最大变量之一,这一现象正在对东亚乃至世界造成巨大冲击,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更是感受深刻。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给日本社会带来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中国军费的大幅增长和军事能力的大幅提高及其对周边安全和历史遗留领土问题的更多参与和关注,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一种强烈的威胁感,再加之在日华人犯罪和食品安全等一些问题的出现,使日本社会普遍产生一种对中国的厌恶感。这种感觉纠结在一起,就使得日本的政治生态更加右倾化,在对华政策上更多地显示和采取了竞争、防范与对抗的一面。尤其在面对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越来越强大及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也相应得到强化,因为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就常常互为“他者”,即互相作为参照物而刺激对方成长或强化。^①

四、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是在美国、中国等主要大国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以及在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及其社会意识的影响下,共同作用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对日本而言,选择这种政治是顺应形势变化的自然反应,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或不可接受,但对其他国家而言则不同。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或者说这种政治倾向是否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呢?尤其对中日关系而言,这一政治倾向意味着什么?

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显然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例如,如果修改和平宪法及取消其中第九条即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和不拥有军队的条款,会使很多中国人想起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而感到威胁,并因此会认为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或要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更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严重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同样会使中国人认为日本这样做是为了掩饰自己罪恶的历史,因此就有可能使历史重演;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对中国并不友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的,因此也成为恶化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与下滑,与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和发展直接相关。日本政治右倾化堪称是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

^① 关于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比较及其冲突,请参阅梁云祥:《中日民族主义比较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

根源。”^①

不过,这样的分析和认识似乎仍然显得有些过于宏观和简单。一般而言,在中日关系中只要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很多人都一概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国内的某些舆论常常将钓鱼岛争端归咎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之一,可实际上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在内的政治势力在此问题上基本都站在同中国对立的立场上,竭力主张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即使是真正属于政治右倾化的一些内容,例如,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就出现过多次,当时尽管也引起了中日关系的一些摩擦,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造成中日关系的根本对立。

也就是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现象,其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逻辑,很难简单地用好与坏来判定或者只是简单地加以反对。对中日关系而言,伴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中国的政治和对日外交也在发生变化。正是因为双方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外交战略渐行渐远,相互影响,相互感到威胁,因此才出现了目前的恶化状态。

日本政府想要修改宪法和成为正常国家,不应过度解读为就是要恢复军国主义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且不说目前的国际环境和日本的国内政治对其要想恢复军国主义存在众多限制,而且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其实对日本是有利而无害的。此外,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因为日本军国主义也曾使美国深受其害。那种认为美国也愿意看到日本恢复军国主义并挑战和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的观点,至少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日本的修宪虽然还需要跨越一些法律门槛,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对日本的这一政治进程只可能关注而很难阻止,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修宪后的日本的国际作用是否会增大,而是修改后的新宪法是否仍然能够保证日本做一个和平的国家,其发挥的国际作用是否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的利益。今天,日本想要追求成为正常国家本身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关键问题不是日本应否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而是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后会对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如果并非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尤其是在联合国范围内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这样的正常国家就应该视为可接受的。

对于日本社会某些政治家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和行为,当然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因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感情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正义所在,而且包括日本盟国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和国际舆论,也不可能在此问题上站在拥有错误历史观的那些日本政治家一边。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不应该简单

^①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153页。

地解读为日本要恢复军国主义,虽然在这些错误言论和行为中有对过去军国主义的怀旧情结,但这并不会必然使整个国家的政策导向军国主义。否则,简单化处理效果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日本普通民众的反感,反而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就是说,真正的批判并非简单地宏观过度定性,而是对历史真相进行调查了解和研究后对错误历史的揭露和修正。

对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也需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因为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会有其两面性,即一方面都会有赞赏本民族文化传统和颂扬本民族优越性的内容,同时也会有一些排外或蔑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极端思想和内容。如前所述,日本新民族主义的主要部分是消极的,尤其在针对中国方面,基本上是采取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不过同样属于新民族主义的有些内容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至少应该能够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容。例如,2005年11月,日本出版过一本深受日本国民喜爱的畅销书《国家的品格》,该书的主要内容就在于批判近代以来以西方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文明社会的疾病,认为21世纪应该是各民族发挥各自传统文化的时代,应该发扬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良品格,比如诚实、勇敢、忍让、知耻,以及爱家族、爱乡土、爱国家、爱人类的爱心等,同时也明确反对战争和排斥其他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该书虽然过度颂扬日本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甚至认为日本文化具有拯救西方文明危机的作用,而且其中还用到了我们已经很难接受的概念,如“武士道”等,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反省现代文明,提倡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并没有否认或美化日本过去进行侵略战争的历史,也没有鼓吹对外扩张和蔑视其他民族的内容。

正是因为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并不是简单地可以只凭好与坏或黑与白来加以判断,其中有些内容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大部分人的共识,所以这一政治倾向并非仅仅是一部分右翼或右倾化政治家的一时行为,而是日本社会比较普遍的政治选择,因此,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将是一种长期的政治现象。对此,中国不能将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景完全寄希望于日本政治不再右倾化上,而只能在承认日本政治现实和适度影响日本政治的同时,寻找从宏观上缓解中日关系困境的途径和方法。

也就是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确实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993年,日本政局变化导致日本国内左翼政党力量严重削弱后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的同时,也恰恰是中日关系开始摩擦不断的时期,因此容易使人们感觉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恶化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不过,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似乎并非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否则就很难理解1998年中日两国曾经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两国又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并且在此后直至2010年“撞船事件”发生之前两国一直保持了比较融洽的关系。

目前,国家关系已非冷战时期那样简单地地区分为友好或者对抗关系,中日关系

也已经不是简单地可以用“左”倾或者右倾来决定。不管日本政治是“左”倾还是右倾,为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双方主观上应该都愿意保持一种和平与非对抗的正常关系。然而,为什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断断续续时好时坏,且基本上向着恶化的趋势发展呢?具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有中国进行核试验、台海危机、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确认、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东海油气田摩擦,直至目前的钓鱼岛争端,这些事件都程度不同地激化了中日矛盾。为什么这些事件中的大部分问题在过去就一直存在但却并没有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呢?其实,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正在逐步相对固化的结构性矛盾,即中日关系已经被一系列因素所左右:在安全上相互不信任的“安全困境”,两国实力对比相对平衡引发的相互威胁感和激烈竞争,双方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冲突及双方国民感情严重恶化等。在这些结构性矛盾面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放大为彼此难以妥协和让步的重大问题,甚至彼此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解读为是针对对方。因此,只有缓解乃至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矛盾,中日关系才能改善并走向真正的正常化。为此,中日两国彼此都必须逐渐适应对方的变化,例如,日本要能够逐渐适应中国崛起乃至超越日本的现实,中国也要能够逐渐适应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唯有此,才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赢之路,否则,中日关系可能永远走不出目前的困境。